

會道門與宗教的區分

韓溥編著

群众出版社



2 028 9379 8

会道门与宗教的区分

韩 溥 编著

(内 部 发 行)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会道门与宗教的区分

韩 溥 编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振兴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875 印张 57 千字
1984 年 7 月第 1 版 198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199 定价：0.34 元

(内部发行)

前 言

我们知道，会道门并不是什么宗教团体，而是封建迷信组织。由于历史的原因，几乎都有着反动的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所以一般称之为反动会道门。解放前，它们长期同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相勾结，以焚香、唸经、扶乩、仙水治病等迷信手法，欺骗、压榨和毒害人民，直接为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效劳。解放后，它们制造反革命谣言，散佈变天思想，煽动一些人反对共产党，采取各种手段妄图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因此，早在五十年代初期，人民政府就开展了一场取缔反动会道门的群众运动，对已经发现的反动会道门坚决给予取缔，惩办了少数罪行严重的道首，教育和争取了其成员中的绝大多数。此后，虽然仍有少数漏网的、坚持反动立场的顽固分子，但他们大都消声匿迹，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破坏活动。

近年来，随着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的实施，一些地方的反动会道门残余分子错误的估计了形势，又妄图死灰复燃。他们利用群众中的某些封建迷信观念，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幌子，恢复和发展会道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毒害人民群众，危害社会治安，破坏四化建设。

要加速四化建设的进程，就必须排除干扰，清除隐患，造成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就必须坚决打击反动会道门

的复辟活动。为了识别和揭露会道门的反动面目，弄清会道门与宗教的区别，笔者根据自己的所知和实际工作的体会，编写了这个小册子以供读者参考。

本文的重点是同读者研究、讨论如何把会道门同宗教区分开来的问题，但为使读者对会道门有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也用了一定的篇幅介绍了它的由来和它的反动性、顽固性，由此也可了解与会道门斗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笔者在一九六四年以前曾接触过有关方面的工作，但那时忙于实际工作，无暇对会道门作系统、深入的研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考虑到当前实际斗争的需要，在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鼓励下，冒昧地草拟了这个小册子。虽几经修改，但由于个人水平低，调查研究不够，片面和谬误肯定不少，诚祈读者批评指正。

对关心和指导本书编写的公安部一局有关同志以及文中所引文章的作者，恕未一一提及，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韩 溥

一九八三年三月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会道门的由来	(1)
第一节 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	(1)
第二节 会道门产生的概况	(5)
第二章 会道门与宗教的区分	(10)
第三章 会道门的反动性和顽固性	(69)
第一节 会道门的反动性	(69)
第二节 会道门的顽固性	(77)
结束语	(82)

第一章 会道门的由来

会道门与宗教的性质绝然不同，但宗教特别是佛教，对会道门的产生却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第一节 佛教我国的传播和发展

佛教从印度传入我国已有二千年左右，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西汉末东汉初至魏晋，我国佛教处于初传阶段。魏晋时期，佛教吸取了儒家的思想，对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极为有利，因而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被扶植利用，成为我国封建统治的一根精神支柱，开始了大发展。到了南北朝以至于隋，佛教进入大盛时期。南朝梁武帝肖衍为梁王朝的开国皇帝，他钦定佛教为国教可说是尊佛典型。韩愈在《谏迎佛骨表》中说：“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梁武帝在大通元年，中大通元年，太清元年，三次到同泰寺为“功德”舍身作佛教奴婢，由儿子和大臣等出钱赎回。北魏孝文帝时，政治衰朽，社会混乱，朝廷及鲜卑贵族一向求助于佛教，任其无限制地发展。北齐政权基础薄弱，亦借助佛教进行统治，当然更大力扶植它。

公元五八一年，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即位当年就

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一时天下风靡入教，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佛教仍为正统国教。隋文帝崇佛，亦可谓少有的典型，在位度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全国编写佛经四十六藏十三万卷，造佛像六十余万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零九千余躯，多次诏令各州营造寺塔五千余。（《开元录》卷七；《续高僧传》卷十五；《义解总论》；《辨正论》卷三）他令天下一人布施十文以下，借此进行全国规模的宗教灌输，在民间狂热地煽动净土崇拜，堵住农民起义的道路。隋文帝幼时曾受尼智仙抚养，及为天子，重兴佛教，皆如尼言。他说“我兴由佛法”，认为天下一统是由佛教之力。因而命天下在舍利塔内各作智仙之像以报旧愿，命史官王劼为智仙作传。在公元六〇四年的诏书中说：“宣扬佛教，感悟愚迷”。公元五九一年，隋文帝诏征沙门灵裕说：“朕尊崇三宝，归向情深。恒愿阐扬大乘，护持正法。故远召法师，共营功业。”龙藏寺碑文谓隋兴佛法为“拯既灭之文，匡已坠之典”。隋文帝与灵藏律师有布衣之交，即位后为灵藏建大兴善寺，敕左右仆射两旦参问起居，至处禁内，则与帝同伦，坐必同榻，行必同舆，经纶国务。灵藏度人数万。隋文帝还常召高僧杜顺入宫，奉之如佛。他于御床前置高座请僧讲经。公元五八五年，他诏法经法师于大兴殿受菩萨戒，敕谓“佛以正法付嘱国王，朕是人尊，受佛付嘱，自今以后迄朕一世，每月常请二十七僧随番上下，经师四人入内讲经，每夜行道。”他还于公元六〇〇年下诏禁毁佛道等像，违者以大逆不道论罪。佛教在隋末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不仅起着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作用，而且直接充当了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帮凶。如隋军阀王世充诱骗三万江南农民起义军，在苏

州通玄寺前“焚香为誓”，诡称一个不杀，然后全部骗杀于黄亭涧。（《资治通鉴》卷一八二）

公元六一八年，隋炀帝被杀，隋王朝覆灭。在唐王朝的建立过程中，佛教和道教为之建树了功勋。当唐高祖李渊在太原（晋阳）起兵时，把兴国寺、阿育王寺等寺院作兵营。沙门景晖早就宣扬李渊当承天命，为李兴兵灭隋夺取政权制造舆论。所以公元六二六年，当太史令傅奕七次上疏请除佛法时，大臣裴寂斥责傅，谏高祖说：“陛下昔创义师，志凭三宝，云安九五（皇帝登基），誓启玄门。”这就说明了佛教在唐王朝建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和李渊登基当皇帝时对佛教的报赏态度。所以尽管傅奕鉴于佛教对国家社会的危害，连续七次谏高祖，请除佛法，高祖一度有所动摇，但听了裴寂的一席话，也就作罢。公元六二二年，李渊为统一天下，对已在江南建立大吴政权的江淮义军首领杜伏威，以吴王头衔诱其前往长安降唐，但杜对李的诏书“不悦于躬”。这时有苏州通玄寺沙门慧颢对杜采用因果报应的教义进行说教，终于使这个出身贫寒，十六岁就成为山东长白山起义军首领的农民领袖，在佛学思想武器面前缴械了。

唐朝大兴宗教，尤崇道、佛。东西方的宗教如袄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接踵而来。唐二十二帝，除武宗惟崇道教，废除其他一切宗教外，余均大兴道教和佛教。唐为李家的天下，而道教尊李耳（老子）为教主，所以唐朝始终至尊道教，视道教为李姓的宗教。唐从初建就大立寺庙道观，大封僧尼、道士。道士岐平定被封为紫金光禄大夫。高宗封道士尹文操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常少卿，命道士叶法善封岳，辟方四十里充宫观长生之地，禁樵采，断田猎。唐中

宗以沙门法藏平张易之乱有功，赐鸿胪卿职，并敕嘉奖：“凶徒叛逆，预识机兆，诚恳自襄，每有陈奏，奸回既殄，功效居多。”唐代宗为天竺僧不空于五台山造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瓦上，费钱亿万。封不空为肃国公，食邑三千户，死后赠司空。《资治通鉴》载：“胡（古代称西域为胡）僧不空，官至卿监，尊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公元六六四年，玄奘卒，高宗为之废朝数日，五次下敕令治丧事，殓以金棺银椁，葬日京城及诸州五百里内送者百余万人，以绘采三千匹，结成涅槃，与以载柩，当日宿于墓所者三万余人。公元六八四年唐高宗卒，中宗即位，武后摄政，大崇佛教，公元六八五年修东都故白马寺以僧怀义为寺主，怀义与洛阳诸大德在内道场念诵，威势凌人，王公朝贵皆匍匐礼谒。公元六八九年，突厥犯边，以僧怀义为新平军大总管，率军击之，加辅国大将军，进右卫大将军，改封鄂国公、柱国，赐帛二千段。

公元六九〇年，沙门怀义与法明等十人进《大云经》四卷陈符命，说武则天是弥勒下生，当代唐作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沙门、道士、四夷酋长六万余人上表请改国号，正迎合武则天之意，即改国号周，加尊号“圣神皇帝”，制颁天下。令两京（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诸州各置大云寺，各藏《大云经》一本，封法明等为县公，皆赐紫袈裟银龟袋。武则天以“释教开革命之阶”，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公元六九一年，令神秀禅师入京行道，肩舆上殿，则天亲加跪礼，内道场丰其供施，时时问道，王公士庶竞至礼谒，望尘拜伏，日有万计。公元七〇五年则天卒，中宗复位，尤加重礼崇神秀，执弟子礼，称秀主摄心息想。七

○六年神秀卒，中宗及王公亲送葬。是年中宗为赏造圣善寺有功，给僧慧范、法藏等九人并加五品阶，赐爵群县公。道士史崇等加五品阶，除国子祭酒，同正叶静能加金紫光禄大夫。慧范畜貲千万，太平公主与通，御史魏传弓劾其奸赃四十万，请论死，中宗竟赦之。

由于唐代统治者的尊崇，各种宗教尤其是佛教和道教大发展，佛教宗派林立，一时极盛，成为我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

隋唐时代佛教的兴盛，虽然在中外文化交流，繁荣我国文化艺术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充当了统治阶级维护封建制度、麻痹劳动人民反抗意志的得力工具，激化了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由于佛教的影响深入社会各个角落，有的农民起义不得不以异教的旗帜作号召；而佛教在当朝的显赫地位，也促使一些妄图显贵至尊又厌烦佛教清规戒律束缚和经典浩繁的佛门丑类，另立门户称祖传“道”。这样，在宗教特别是佛教发展的基础上，异教、旁门外道就滋生起来了。

第二节 会道门产生的概况

早在隋、唐之前的北魏时期，就出现了异教“大乘教”。北魏统治阶级竭力提倡佛教，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当权僧人成为僧侣地主。广大农民和下层僧人不甘受寺院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各种形式开展反抗斗争。冀州（今河北冀县）沙门法庆以“大乘教”组织农民，宣称“新佛出世，除去众魔。”延昌四年（公元五一五年）聚众起义，被推为首领，并以渤海

人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有众五万余。起义军击杀阜城县令，破渤海郡（治今河北南皮东），又在煮枣城（在今河北枣强）击溃魏冀州刺史肖宝寅的军队。所到之处，焚寺院经像，杀僧侣地主。北魏派元遥率步骑十万，疯狂镇压，法庆战败，被俘牺牲。大乘教的武装斗争转至瀛州（治今河北河间），至熙平二年（公元五一七年）失败。

公元五九三年，广州有僧行“塔忏法”及“自扑法”。依《占察经》，官、僧都称之妖异，被隋文帝敕令禁止。

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六一〇年），京城“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隋书·炀帝上》）这次发生的弥勒教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余波未平。公元六一三年继有唐县人宋子贤在高阳亦称弥勒佛出世举兵。同年还有扶风沙门向海门也称弥勒出世，聚众数万人。（同上；《册府元龟》卷九二一）弥勒教的起义，一浪推一浪，冲击着隋王朝。

公元六一八年隋炀帝复灭的那年，都渔阳怀戎沙门高昙成聚徒五千人，乘县令举斋之机，杀县令及镇将，自称“大乘皇帝”，立尼静宣为皇后，改元“法轮”。（参见《资治通鉴》卷一八六）这次大乘教起义，爆发在北魏沙门法庆领导的大乘教异教起义的河北地区，一脉相承。其口号是：“新佛出世，除去旧魔。”（见《魏书》卷九《肃宗纪》；卷十九《元遥传》；《佛祖统纪》卷三十八）。

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六二二年），沙门昙选责智满聚众“坏佛法”，以“前代大乘之贼，后世弥勒之妖”戒之。（《续高僧传》卷二十四《昙选传》）公元六八三年，“绥州部落稽白

铁余以佛事惑众作乱，自称光明圣皇帝，置百官，进攻绥德等地。”唐高宗“遣将程务挺等平之。”（《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公元七〇六年，“西京有术士秘书员外监郑普思谋为妖逆，雍岐二州妖党大发，西京留守苏瓌收郑下狱，以普思妻第五氏擅鬼道，为韦后所宠，中宗特敕苏瓌释之，瓌不应，乃流普思于儋州，其党皆伏诛。”（《旧唐书》卷七、八十八，《资治通鉴》卷二〇八）唐玄宗开元三年（公元七一五年），有“白衣长发会”，“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祥，或诡作小经，诈云佛说。”（《新唐书》卷五；《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北梦琐言》卷四，也记有青城弥勒会妖人事。《册府元龟》卷九二二亦载开元初有王怀古对人说“释迦牟尼佛未更有新佛出。李家欲末，刘家欲兴。”玄宗敕禁妖讹，禁白衣长发会，敕诸道按察使捕杀之。

白莲教的活动在我国历史上延续的时间较长，影响也较大。它早期称“白莲会”，是摄取佛教、明教和历史上的“弥勒教”的部分内容而建立起来的秘密结社组织。始于元代栾城县人（今属河北省）韩学究，他以“白莲会”广招徒众，于至大元年（公元一三〇八年）被查禁，韩学究被谪徙河北永年县，但组织仍不断发展，参加者日渐增多。在反抗元、明、清封建王朝统治的斗争中，与白莲教相结合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延绵不断。如泰定二年（一三二五年）息州（今河南息县）有赵丑斯、郭菩萨倡言“弥勒佛当有天下”。至元三年（一三三七年）信阳有棒胡也利用白莲教组织起义。元末，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复有韩学究的孙子韩山童出来继承祖父之余业，进行传教活动。山童更倡言天下将大乱，弥勒佛降生，有明王出世，宣称他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当为中原

之主。他以“贫极江南，富称塞北”，大力揭露蒙古贵族的残酷剥削，鼓动治河民伙起义。据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说：“韩山童等因挟诈，阳凿石人，止开一眼，镌其背曰：‘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预当开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相为惊诧而谋乱。”《元史》卷四二《顺帝纪》五载：“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年）五月辛亥（初三），颍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以红巾为号，陷颍州。初，柰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等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事觉，县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杨氏，其子韩林儿，逃之武安。”

以上可见，韩学究创立的白莲教虽于一三〇八年被查禁，由于元王朝的残暴统治，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白莲教在这种情况下，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到山童时，已遍及河北、河南、安徽、湖北、山东、陕西等地，在已出现人民“多乐从乱”并视“从乱如归”的大好形势下，韩山童与刘福通等遂于公元一三五一年，以白莲教形式组织农民起义，史称红巾军起义。他们宣称自己是汉帝赵宋之后，以迎合人们的正统观念，来反对元蒙统治者。起义军声势浩大，震撼了元王朝的统治。

一三六八年明王朝建立后，白莲教又不断变换名称，多次发动推翻明王朝的起义。如洪武三十年（一三九七年）正月有陕西田九成起义。公元一六二二年有蕲州王森以白莲教和闻香教为旗号，自称闻香教主，宣扬以得妖狐之异香，组织起义。同年五月有他的门徒山东徐鸿儒继起，自称“中兴福烈帝”，

建立了以“大成（乘）兴胜”为年号的政权。到了清朝，白莲教继续蔓延，就它发动的起义，有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山东王伦起义，教主安徽的刘松被捕充军，后由他的门徒刘之协、宋之清等以河南麻邑儿童王发生称明裔朱姓，号召教徒起义，被镇压下去，地方官吏大肆搜捕，株连许多无辜，激起荆州、襄阳、四川、陕西、甘肃等地的余众，以官逼民反为词，纷纷揭竿而起，蔓延五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嘉庆元年至十年（一七九六——一八〇五年）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白莲教的组织并未被彻底摧毁。所以在此之后不几年，即嘉庆十八年至十九年又爆发了冀、豫、鲁以林清、李文成为首的天理教起义。清代白莲教的支派有“清水教”、“天理教”等。

继白莲教之后产生的罗祖教和渊源于“罗祖”“罗八祖”的先天道、一贯道、同善社、归根道、瑶池道等等许多会道门的衍生情况，我们将在第二章第二节中作介绍，这里就不叙述了。

早期异教的出现及其起义是阶级矛盾尖锐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也有的异教活动表现为动乱时期的夺权斗争），它与农民起义汇合成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洪流，有着重大的历史功绩。但因异教组织本身是封建迷信组织，其领导者有着阶级的局限性，随着历史的前进，有的不复存在；有的则失去其进步作用，蜕变成组织庞杂、成员众多、专事妖言惑众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外道会门；更者甚者，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为反动统治阶级所扶植利用，变成一股封建恶势力。如前面谈到的大乘教、白莲教，解放后进行了一系列与人民政权为敌的反革命活动，对于这些已成为反动会道门的异教组织，我们进行坚决的打击和取缔是完全必要的。

第二章 会道门与宗教的区分

会道门的产生虽然与宗教(主要是佛教)的传布和发展密不可分,但两者又不是一回事,正确地区分两者,对于开展同会道门的斗争是非常必要的。这里我们从两者的组织名称、历史沿革、组织机构和称谓、信仰尊崇、经典、教义、一般活动特征等七个方面来谈谈它们的区别。

一、从名称来区分

一切个人和组织,都有相区别的名称。据此去区分会道门与宗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一) 各宗教的名称

我国现有的宗教是:佛教,又称释教;道教;伊斯兰教,又称回教、清真教、天方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教派和一些小教派)。天主教又称罗马天主教、公教、罗马公教、加特力教、旧教;东正教又称正教、希腊正教;新教有的也称耶稣教。我国习惯指基督教为新教,以示同天主教相区别,故在报刊上有时出现基督教与天主教两者并列,但在说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时则包含了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和其他小教派(下文凡未把它与天主

教并列的，即是按国际习惯，包括了各教派)。

上述宗教各有许多宗派，名称繁多，还必须进一步搞清楚，否则也会出差错。有的会道门就是诡称某一宗教的宗派而蒙骗人，逃避取缔会道门运动，混进了统战队伍。如大乘教就是针对佛教有大乘、小乘两大派和繁多的宗派，而以挂着“大乘正宗”的横匾骗取了当地宗教事务部门的相信，确认它是佛教中的一个宗派。当佛教人士对其进行揭露时，有的同志还认为是佛教内部的矛盾斗争。而其实佛教并没有什么“大乘正宗”这样的宗派，一九五六年，经有关部门调查研究，确定大乘教为反动会道门。

现将各宗教的各宗或教会名称列后：

佛教的宗派名称

它有大乘和小乘两大教派。小乘教派有：成实宗；俱舍宗。

大乘教派有：

三论宗又名法性宗、空宗、嘉祥宗；

禅宗又称少宝宗和佛心宗，后其中又衍生出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北宗时临济宗内又分出黄龙宗和杨岐宗；

唯识宗又称法相宗、慈恩宗、有宗；

天台宗又名法华宗；

律宗又称南山宗；

净土宗又叫庐山宗和莲宗；

华严宗又名贤首宗、清凉宗、法界宗；

真言宗又称密宗、开元宗或称瑜伽密教；

喇嘛教，也称西藏佛教，它又分为黄教、红教、白教和